

星洲高空上的風箏

沙百里著

梁潔芬譯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至十九日在星加坡舉行的中國文學國際會議盛況～

一件文化界的大事揭開了一九八三年的序幕，可惜，國際新聞界並未報導這次盛舉。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星架坡舉行了一個中國文學的國際會議，由本地華語團體，特別是「星洲日報」，和一個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文化教育組織（名為「人民社會」）所主辦。這次會議之所以不受到注意，據解釋，其原因有以下數點：(1)沒有外國通訊記者在場，(2)會議採用普通話，並缺少傳譯系統，會中只有一個下午是用英文來討論本地英語、淡米爾語及馬來語的文學。

這次會議雖然以太平洋的東亞區域為主，但它確實具有國際性。來自不同地區及政治背景的二十名作家共聚一堂；其中三名來自台灣，四名來自美國，來自香港的則有三人，馬來西亞二人，來自菲律賓、韓國、日本各一人。當然，也包括作東道的星洲作家。會議中大部份時間用於表達當代小說家和詩人在文學上的爭扎。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這次會議有一位日本漢學家出席，這幾年來，他曾專門研究星架坡及馬來西亞的文學。

超越政治及意識型態的界限

華語的「星洲日報」在會議期間每天以兩大頁的篇幅報導內容。英語的「海峽時報」也以政治的立場作了簡略的報導。這些報章的記載只是微弱地反映了與會者的友誼交流，其實這幾天充滿詩意的共融，幾乎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泉源。

在這幾天內也不乏同情的表現，來自中國大陸的艾青和蕭軍是最矚目的作家，他們已年逾七旬。艾青更因抱病在身，常沉默寡言，但對人却常報以微笑，他靄然地在自己的作品上簽名留念之多，以致手臂也有點僵硬。蕭軍以沉鬱的臉容，率直的言論以及高貴的心懷贏得在場每個人的同情。號稱台灣「長春樹」的女詩人蓉子向他獻上自己的作品——青年文學，並宣稱他擁有一顆「赤子之心」。還有一個像是被寵壞的浪子，他就是日籍漢學家今富正己。小說家兼文評家聶華苓與今富正己在同一小組，在回憶年青往事時，她不禁想起日軍佔領漢口時的苦況，以及她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憎恨。為要從往日

的噩夢中醒來，她猛然起座，向這日本漢學家呈奉兩部近作，以示友誼。

「重新發掘友誼」的氣氛從第一天就很自然地表現出來，這可由一件事情上見到。當蕭軍上台講話時，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從口袋裏抽出一支大雪茄來（爲星架坡人而言，吸煙是一種社會性的罪）。當時來自台灣的作家洛夫馬上起來，給蕭軍點火，此舉立刻搏得全場的掌聲。在會議的尾聲，有即時創作的詩篇，以表揚重新發現的友誼。洛夫把艾青聯想爲常綠的盆栽，即席成詩，並向艾青朗誦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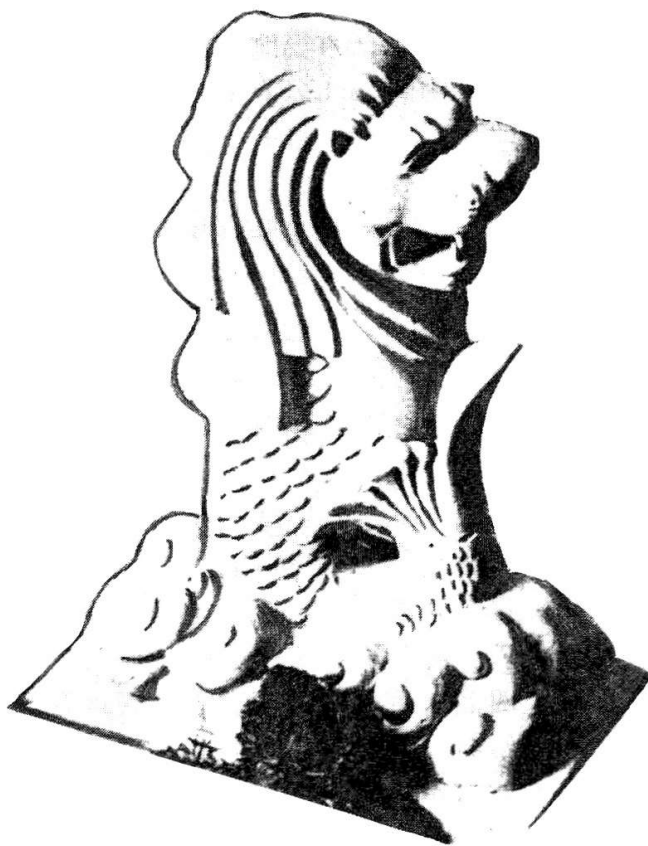
同時，一位美籍華裔詩人鄭愁予也即興作了一首詩，贈給蕭軍，題名「風箏」。

這些擁有細膩及敏銳心靈的男女，曾經一度因歷史上的悲劇而分開，他們有很多話要說，這幾天，他們就以自己的方式彼此傾訴。

本世紀舞台劇中的演員及証人

在座大多數的作家都曾經歷各種蹂躪。放逐、壓迫、以及隔離人群等痛苦，在他們的心靈上熨上一層憂傷的烙印。艾青孱弱的體質以及單目失明的事實，證明了他們長期以來所受的痛苦。艾青在巴黎藝術學院畢業回國後，由於被認爲有左傾思想，在一九三二年於上海遭國民黨的公安人員所囚禁。幾年後他又在中共的反右傾運動中成了犧牲品。一九五八年又被送到新疆去勞改兩年。但使他最反感的經歷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他在暗無天日的囚籠裏生活了五年，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清理廁所，終於導致他的一只眼睛失明。直至七十二高齡他才獲平反，重披「偉大詩人」的榮譽，今日被認爲與郭沫若並駕齊驅。

聶華苓的經歷也充滿迷惘與悲哀。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在文華酒店，她回憶起在漢口的童年往事。她的父親被共產黨軍隊殺害，她由重慶流徙到台灣，在那裏定居，並與胡適合作。一九六四年她離開台灣到美國去，與保羅因格（PAUL ENGIL）結婚，後來在愛荷華州創辦了一個國際作家中心。從那時起，約有四百名作家在這中心接受了一段時期的訓練，其中三分之一是來自大陸及台灣。這種交流的經驗，不但創造了「愛荷華國際作家中心」，也使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作家彼此建立友誼。



中國文學的普世使命

直至今日爲止，國際文壇長期被西方作家所壟斷。莎士比亞和狄更斯、雨果和羅曼

羅蘭、托爾斯泰和高爾基在中國的知名度，遠超於中國名作家在歐洲的知名度。今天若翻閱國際文壇上得獎的名單，甚少有非西方作家在內。

什麼因素使到全球忽略了對中國文學的欣賞呢？這個問題是在次星洲會議中也有人問過，中國的作家們很警覺到作品所表達的宇宙性訊息。他們從人存在的深處探索了人類的存在及命運的問題。他們小說裏的大小角色都經歷過現代社會的大危機，也體會到時代最深的渴望和紊亂。他們追求一個超越意識型態、政治、和種族界限的「人性」。中國的文學與藝術極富象徵性及戲劇性。它是由詩的泉源中流溢出來的。鄭愁予曾用以下幾句話道出了這個思想，他說：「詩好比花蕊，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猶如花瓣。小說及其他文學逃不了枯萎的命運；而詩却可以使它們恢復青春。」

但中國語文不易為大部份人懂悟。它以幾千個結構複雜但極能傳意的文字，代替了西方語文的文法。由於商業上的來往及地區性的日常生活經驗，在星架坡亦曾產生過把中文翻譯為外語的問題。

聶華苓強調需要把更多的中文作品翻譯為英文，她與另一位居美作家於梨華有同樣的見解。於梨華曾說：「必須使西方了解東方，亦使東方明白西方。」

今富正已認為，星洲人既有雙語教育之利，最能負起解決翻譯問題的任務，今後該把更多的中文著作譯成英文、日文及其他語文。她更呼籲出版界多出版中文作品的書評。

這些總結的建議，使人覺得他們忽略了目前許多中國文學翻譯及研究中心。會中無人提及北京外語翻譯所的出版物；亦未提到

歐洲方面所做的翻譯工夫。至於書評及文學評論方面，香港有幾份雜誌的貢獻亦不可忽視。

日人今富正已提出了令到中國文學家放心的一點，就是：「現在比從前有更多外國人接觸中國語文」；以日本為例，單在東京一地已有七八間中文圖書館，超過十萬日本人能閱讀中文書籍。在短短幾年中，中國語文系畢業生每年由一萬人躍升至二萬人。這一點對東南亞的作家是一種鼓勵，因為讀者的增多為他們非常重要。

文學在中國的活力

東南亞、日本、美國及韓國的華裔作家的希望，寄寓在國內文藝生活開展的局面。雖然由於恐怕文藝會影響到政治及社會的紀律而一直對文學創作加以控制，但在過去三年內，情況已有好的轉變。超過一百份以上的文藝刊物得到重見天日。艾青的夫人高瑛在這方面謹慎地提出了意見，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限制」的問題，而是作品的「質素」問題，因為許多作品的質素未能達到理想。出席這次會議的作家，並未對最近的發展作一全面性的檢討。他們委托蕭乾介紹中國文學裏的「報告文學」。

這個選擇對星洲人是正中下懷，因為南洋文學的發展與中文報刊息息相關。幾乎全部的本地作者都以撰寫文藝副刊起家。再者，蕭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倫敦及劍橋生活了七年，他的友人之中有些成了今日星洲的領袖，所以他對英語的文化氛圍一點也不陌生。他誦讀了有關中國三十年來報告文學的發展的論文。他指出報告文學的特點是以報導事件為主，但它仍能以文藝的方式來描寫人。所以，報告文學的地位是介乎

報刊的報導與文藝短篇小說之間。

某些與會者對國內文藝創作的實際可能性感到憂慮，幸好聶華苓與國內作家常有接觸，所以她能作樂觀的回應。她提到了國內某些近期作品的質素，尤其是小說家戴后瑛（震旦大學教授）的作品「人啊！人！」甚能反映今日學生的心態。這類作品可以打通中國人文主義者靈感的經脉。這幾年來艱苦的經驗，使到蕩漾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人道精神再度復甦。

星架坡——東西交流的中心

這次會議所打開的廣闊視野，遠超過主辦者所期望的。星架坡內政部的官員李焯才在開幕詞中表達了這次會議在政治上的意義。他說：「目前，我們正在努力推行國語，因為我們不想華裔人士忘掉了他們的根……我們希望華裔人士繼續發揮中國語文內的靈感和智慧。」在星架坡的中文報界方面，則希望這個會議為本地作家帶來一些新靈感，以及使他們為海外人士所認識。

無疑，這些目的都一一稍為得到實現。但本地中國文學的命運仍受到威脅。試看：星架坡日漸趨向於運用英文，中文學校從半消失狀態至全部消失，華語媒介減少，在這個會議後兩個月，兩份中文日報於八一年三月合併為一份。

然而，星架坡對這個有中國作家出席的國際性會議甚表歡迎。中國的藝術家、運動員、舞台劇、商業展覽、電影和非政治性的刊物，早已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交流的角色。這次中國作家受到星架坡的歡迎，使到中國與世界各地的交流又洞開了一扇門戶。

在這情況下，星架坡領袖的政治性恐懼最後不但過去，而且還得到了補償。所有外

來的作家對星洲的生活質素、綠島的美景、星洲居民的彬彬有禮、以及真正現代化中的科技成就等等讚賞不已。艾青的夫人高瑛及蕭乾的夫人文潔若互相承諾，要告知中國：這裏現代化的成就有賴於佔星架坡大部份人口的華裔人士的努力。他們指出星洲很多有關清潔和衛生的特點，他們也為星洲人的和靄以及責任感所感動。

除了星架坡達到本地的目的外，這次會議的中國作家代表對國際的和平與交談亦作了寶貴的貢獻。一部中國文學作品的韓國作家許世旭，對來自北京、台北及美國的中國作家間所洋溢的友好關係，表示大加讚賞。這情景使他寄望韓國的南北和談有所進展。

當中國與別國發生困難，尤其表達在「外交戰略」及「商業戰略」上時，中國作家能以人文的立場發言，帶進另一種更深遠的視野。這次星架坡會議恰好遇上了國際風箏大賽。與會的作者為了要一睹風箏競賽的盛況，便把星期日早上的演講縮短，因此使到日本漢學家不能充份發揮。無論如何，這些五彩繽紛、形狀古怪的巨鳥在星洲滿佈灰雲的高空上飛翔時，此情此景不僅為星架坡這個秩序整齊的城市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而且亦使到中國的詩人重振生機。